

康乾盛世时期的粤商

清政府需要朝贡贸易,但又出于对洋夷的蔑视不愿直接出面,这就产生了代官行事、以十三行为中心的粤商。粤商就是在外商与清政府的夹缝之间两面讨好,从中渔利。在夹缝之间,既受夹板气,也能从两边获得好处。

粤商并非广东籍商人

粤商中有非广东籍者,如曾任十三行行首的潘振承就是福建人。广东籍商人也并非全可以称为粤商,如潮汕商人就更接近于闽商。我们这里所说的粤商是指清代专门从事对外贸易,以十三行为中心在广州经商的商人。

当时的中国处于“康乾盛世”,其实以经济而言,尽管GDP总量高于英国,但在1347年前,一个英国盖屋顶工人的助手,每天工资约为一便士,可以买六斤小麦,在维持自己生存以外,养活一个人是没什么问题的;而中国同样的蓝领工人,月工资才“二钱头”,自己生存都不易。而且,“康乾盛世”也无法与“贞观之治”相比,因为在唐朝对外国人是开放的,也知道国外的先进东西,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当官,而且商人相当自由。康乾盛世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。

康乾盛世的“狂妄”

也许是康乾盛世的虚名助长了统治者的狂妄,他们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,以天朝自居,其他所有国家都是“蕞尔小国”,属于大清王朝的藩属,而且极其落后,尚未开化,所以外国人只能称为“鬼佬”“鬼妹”。

在对外贸易方面,清政府自认为华夏地大物博,无一物不求于洋人,外国人来是进行朝贡,向天朝敬奉自己的宝物,相应的贸易只是附属品,称为朝贡贸易。

但是,清朝的皇帝还是需要朝贡贸易的。一来皇帝特别重视朝贡,因为这可以显示“四海来朝,八方来仪”的气势,表明各藩夷对我天朝的尊重、景仰、臣服,满足皇帝及臣民的虚荣心。各国朝贡来,天朝要表示对夷人的怀柔,所以回赠物品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朝贡物品的价值。二是由朝

贡而允许的贸易,不仅显示天朝的胸怀,而且可以满足王公贵族对这些异国物品的需求。更重要的是皇帝把贸易的关税及其他收入作为“天子南库”,给皇帝和王公大臣带来现实的真金白银收入。

政府想获得朝贡,但又出于对洋夷的蔑视不愿直接出面,这就产生了由商代官行事的十三行制度。广东的对外贸易可以追溯到西汉时,但行商的产生都是清初的事。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,但又需要与洋人打交道。康熙二十五年广东省政府招募了十三家有实力的行商,指定他们代皇帝接受外商的贡品,做贸易,并代海关征收关税。这就是十三行。以后的十三行并不一定是十三家,但仍称为十三行。乾隆二十二年,乾隆皇帝决定关闭其他贸易港口,仅保留广州作为唯一的对外通商港口,十三行是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商。这种一口通商就形成“东南西北中,一起到广东”的局面,也是十三行商人暴富的原因。

皇帝特许的垄断商人

行商都有花钱捐来或由皇帝封的名义官职,但他们仍无实职,亦无权,名为官商,实际上仍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。作为既代表政府,又是商人的十三行,它们有四项职能。第一,作为皇帝特许的官商,独揽外商洋船接待,代皇帝接受贡品,并垄断进出口贸易。第二,代理海关事务。海关作为官方机构,不与洋人直接接触,由十三行承办外商货物报关纳税事务。第三,根据政府的法令约束、驯化外商,监督外商在广州的自由行动。第四,转达外商与政府之间的一切交涉,外商无权进入广州城晋见政府官员。由这些职能看出,十三行是亦官亦商的,第一项职能是作为商人,而且不是一般的商人,是皇帝特许的垄断商人。后三项则是作为官对外商进行管理和监督。这就是粤商与同样是官商结合的徽商的不同之处。但他们的贸易又是垄断的,这就是与同样从事外贸的晋商的不同之处。

粤商的另一边是外国商人,即当时所说的“夷商”。外国商人中英国商人占到80%以上,是主体,而这一主体的代表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。当时在西方是重商主义时期,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

强国和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,以大英帝国自居。英国同样傲视群雄,以世界老大自居。这同样是“傲”,但还是以先进的政治制度、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基础的。

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、有市场潜力的大国,英国当然不会放过;小而言之,英国离不开中国的茶叶、丝绸、瓷器。尤其是茶叶已成为上层人士的必需品,连普通百姓也成为茶迷。英国及其殖民地不产茶,茶的需求如此之大,当然就是最赚钱的商品。英国商人当然要与英国进行贸易。而且,当年在重商主义指导之下,各国都实行高关税。大清政府还不不懂重商主义为何物,所以关税极低。尽管有各种苛捐杂税,而且受官员私下盘剥,但加起来,仍然比其他国家的关税低。到中国经商能赚到大钱,英国商人当然趋之若鹜。

夹缝之间两面讨好

粤商就是在外商与清政府的夹缝之间两面讨好,从中渔利。在夹缝之间,既受夹板气,也能从两边获得好处。

在夹缝之间经商,重点就不在商上。

乾隆皇帝给了粤商十三行一口通商,而且只能由十三行进行行商的特权,这就赋予了他们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。这种垄断排斥了其他商人的竞争,其有利之处是不言而喻的。但获得这份垄断要付出代价。首先是要向皇帝和王公大臣进贡、交钱。除了寻找各方珍奇异物满足皇帝的虚荣心和爱好之外,还要交真金白银。在皇帝和王公大臣看来,十三行的商人富甲天下,“进孝”是应该的。而在商人,不断的盘剥,真是苦不堪言。

行首富可敌国

当十三行商人,尤其是当行首,的确有更多的赚钱机会,而且确实也赚了大钱,先后当过行首的潘振承和伍秉鉴都富可敌国。伍秉鉴在1834年时个人资产达两千六百万两白银,从而进入千年五十名富翁排行榜,而且是中国入选的六人中唯一的一位商人。但也许付出的代价太高了,许多人并不以当行首为荣。小说中潘振承有数次想不干的记载。潘振承的孙子潘正亨甚至说:“宁为一只狗,不为行商首。”尽管他是潘振承的长孙,但坚决不出任行首。伍秉鉴也多次申请退休,但官

府不许可。

1826年,他以五十万两白银的代价将怡和行和行务交给四子伍元华掌管,但政府仍然要他为所有商行作担保。他甚至要求把百分之八十的家产捐给政府,结束怡和行,安享他百分之二十的家产,仍然未被批准。十三行真成了一座围城,外面的人想进去,但里面的人又想出来。

洋人也不好对付。他们向十三行采购各种物品,尤其是茶叶一项成为主要的利润来源,同时也向十三行提供各种洋玩意。但是,洋人也并不全讲信用,洋人欠十三行商人的债也屡有发生。

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十三行商人富有的一面,而看不到他们付出的艰辛也非同一般。晋商做外贸仅仅同洋人打交道,虽然也要接受政府发“龙票”、受盘剥,但比粤商好多了,晋商的外贸商人毕竟不是皇帝直接勒索的对象。徽商仅仅同官府打交道,而没有连坐制等规定,也不用同洋人打交道。粤商则同时在政府和洋人两个方面作战,而其难度远远高于晋商和徽商。

粤商是衰而未亡

清政府限制贸易,英国无法打开中国市场,贸易严重入超,要运送白银到中国,这就引发了走私鸦片。更深刻的原因是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。农耕文明的中国即使开放了贸易,也没有对工业品的需求。所以鸦片战争后,中英贸易在短期内增长也并不大。但鸦片战争对粤商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政府和人民认为十三行为洋人做事是卖国贼、汉奸,尽管他们为政府捐款数百万,但不被原谅。而洋人又认为粤商帮中国政府惩罚他们。粤商两边不讨好。不过致命的一击并不在财产损失上。《南京条约》规定五口通商,打破了十三行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,粤商就衰亡了。1843年伍秉鉴去世,这标志着一代粤商的结束。不过粤商是衰而未亡。他们在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中接受了开放的意识。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口通商结束,他们看到未来发展的增长点在上海,因此纷纷把资本转移到上海。十九世纪初上海是广东人投资和移民的中心,当年的上海话就是广东话,上海被称为小广东。

(梁小民 来源:晶报)

诸葛亮是怎样玩掉那些人才的



“蜀中无大将,廖化作先锋”这句话,现在多泛指没有杰出人才,平庸之辈也能侥幸成才。但它原本是说三国时代蜀汉中后期人才奇缺。那么蜀中为何无大将?这和诸葛亮的霸道有关。

益州广汉人彭口,具有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。彭口拜见刘备,与之交谈“指掌而谈治世之务,讲霸王之义,速取益州之策”,让刘备叹服不已,认为他可与诸葛亮“齐足并驱”,请他“宣传军事,指授诸将”,打下成都后,还破格提拔他。可这引起诸葛亮的不满,表面上跟彭口很要好,背后却常向刘备进言,说彭口“心大志广,难可保安”。刘备多次听到诸葛亮的小报告,对彭口有了戒心,把他贬到小郡江阳做太守。彭口无故遭贬官,不免私下发牢骚,说些对刘备不敬、不忠的话,被人揭发后杀了头,死时年仅37岁。

廖也是很有才干的人,并得到刘备的重用。公元211年,刘备入蜀图霸业,诸

葛亮留守荆州并全面主持日常工作,孙权派使节到荆州访问以示友好,使节问及荆州人才,诸葛亮也不得不说廖立是“楚之良才,当赞兴世业者也”。而廖立的自我评价也很高,认为蜀国除了诸葛亮外,有本事、有能力、理应按委以重任的非他莫属,按现代说法就是诸葛亮第二。刘备死后,诸葛亮却让他居闲职不用,廖立很是不满,耿耿于怀。一次廖立与李邵、蒋琬谈论,对当年刘备不取汉中提出批评,又总结关羽之败在“怙恃勇名,作军无法”,还直接点评了几位当朝人物。于是诸葛亮以“诽谤先帝,疵毁众臣”罪,将廖立废职为民,流放四川汶川一带,直至老死也未能回成都。

刘封是刘备的养子,刘备入蜀打刘璋时,刘封才20多岁,却已“将兵俱与诸葛亮、张飞等口流西上,所在战克”,堪称一员虎将。攻下益州后,被封为副军中郎将。刘备很看重他,没生刘禅时打算让他作继承人。后因刘封在一次战斗中没救关羽,且与孟达不和使之降魏,受到刘备的责怪。刘备只是责备刘封而已,但诸葛亮思虑刘封“刚猛,易世之后终难制御,劝先主因此除之”,导致刘备赐刘封自裁而死。

据三国志和有关史料记载,凡不被诸葛亮信任、恃才狂放,倚武据傲者,都在排挤、打压之列,除上述三人,还有李严、魏延、杨仪、刘琰等人。(黄玉凤 来源:重庆晚报)

皇帝的空调

古时候,天气再热,不能热了天子。于是,宫殿里有了最初的“机器”。这种设备,采用的是冷水循环的方法,用扇轮转摇,产生风力将冷气送入殿中。同时,还利用机械将冷水送向屋顶,任其沿檐直下,形成人造水帘,激起凉气,以达到消暑之目的。到了宋代,这种设备造得比唐朝更加豪华。宋代凉殿不但以风轮送凉水凉气,而且还在蓄水池上和大厅四周摆设各种花卉,使冷风带香,芬芳满室,其冷风效果之好,已使人感到寒口不堪。

皇帝是这样子,大臣自

然趋之若鹜。唐代的高官显贵,有的也建立起私家避暑设施,规模自然比不得皇家。但也巧妙得很。其中专供纳凉用的水亭,就是唐代官吏设置的一种避暑建筑。这种水亭,利用机械将冷水输送到亭顶的水罐中贮存,然后让水从房檐四周流下,形成雨帘,从而起到避暑降温的效果。

此外,每当寒冬季节,都有专职官吏负责采集天然冰块,贮存于“冰井”之中,炎夏期间取出,以供皇家和贵族使用。

(来源:今晨6点)

宋真宗时期没得牛肉吃

宋真宗名叫赵恒,是宋太宗赵光义的第三子。不是长子,母亲也不是皇后,原本没有资格继承皇位,可是,他的大哥赵元佐发疯,二哥赵元偃暴死,皇帝的位子就轮到了他这个排行老三的来坐了。

宋真宗在即位之初,格外勤于政事,他不仅避免了五代以来老百姓的各种欠税,还在咸平六年(1003年)下了一道圣旨,禁止杀牛和食用牛肉。宋真宗说,早在春秋时期,《礼记》中就立下了规矩:诸侯无故不杀牛,意思是杜绝社会各阶层滥杀耕牛和饮食奢侈的风气,遏制腐败。宋真宗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耕牛,发展农业生产。这样看来,宋真宗禁止杀牛的出发点很好。

宋真宗禁止杀牛的圣旨下达后,全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禁止杀牛运动。当阿克敦一直算是代理刑部尚书。直到他致仕都是如此。

(佚名 来源:郑州日报)

难能可贵的是,宋真宗这个做皇帝的带头不吃牛肉。据有关史料记载,当时,开封皇宫里的御厨房一年吃掉43万斤羊肉和4000多斤猪肉,却没有一两牛肉。皇帝不吃珍禽野味,也不吃作为耕田之畜的牛,对保护环境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。在这方面,宋真宗的做法值得称道,尽管他多吃了一点羊肉。

宋真宗禁止杀牛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他的去世。宋真宗去世后,他的第六子赵祯在开封即位,是为宋仁宗。宋仁宗上台以后,废除了他老爸宋真宗禁止杀牛的规定,于是,大宋朝自此又开始杀牛和吃牛肉。到了宋徽宗的时候,吃牛肉的习俗在全国更加风行,《水浒传》里提到的大小饭店,每天都有足量的熟牛肉供应给食客,梁山好汉武松在景阳冈下的小饭店里,就吆喝小二切一大盘黄牛肉。(王吴军 来源:大河报)

三次被判死刑而不死的明清大臣

清朝入关后,始终坚持满族人无须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选拔就可以做官的原则。不过有些满族大臣倒确实是有学问的,阿克敦就是其中一位。他是满洲正蓝旗人。康熙四十八年中了进士,因此被认为学识优秀,授予庶吉士,又进翰林院做编修。康熙皇帝认为阿克敦“学问优”,把他提拔为侍讲学士。以后在康熙朝,阿克敦几乎一直从事有关礼部的事务。雍正继位后,阿克敦还兼“国子监祭酒”,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领导。

可是在“文”这条路上走到头后,阿克敦官运一转,于雍正四年一下子就转成了“武”官,被派到广州代理两广总督兼广州将军,成了“上马管军、下马管民”的一把手。

阿克敦在这期间弹劾了一些广东的官员,得罪了这些广东官场大员,等他转任广西巡抚的调令刚一下达,广东的一些大员纷纷上章弹劾,指责他指示广东新会县令将强盗案件改为盗窃案件,挪用广东海关的额外税银,尤其是指责他指使家人向暹罗来广州的运米船索取“规礼”。雍正皇帝大怒,立即下令将阿克敦就地逮捕下狱,特派大臣到广州审讯。最后仅仅判处阿克敦索取暹罗米船“规礼”一罪,建议为绞刑。正在这时,他的又一个对头告他包庇贪赃的下属,于是加重判处他“斩监候”(判处斩首,等候秋审最终决定是否执行)。

保住阿克敦脑袋没有掉地的是苏北水道疏浚工程,雍正皇帝想起监狱里等死的阿

克敦,把他派到河堤上去戴罪效力。河工结束,他的罪过也算勾销。

乾隆皇帝登基后,重新将阿克敦调回朝廷任职,指令阿克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下一年,正式授阿克敦刑部尚书官职。

阿克敦当上这个“最高法官”不久,就得了个重罪。乾隆十三年,乾隆皇帝在查看翰林院上奏的孝贤皇后册文,其中满文译“皇妣”为“先太”后,乾隆皇帝认为这是个“大误”,立刻要召见阿克敦,想不到阿克敦没有候旨就已经退出宫殿。乾隆皇帝大怒,下令罢去阿克敦所有官职,把这位原来的刑部尚书关到刑部监狱里,按照“大不敬”罪名,打算定罪“斩监候”。这是阿克敦得到的第二个死刑判